

英文是象形文字

English 说文解字

袁立 著

指事字

东西方文化最本质的沟通
统一汉字和英文学习的捷径
以文字考古学为理论基础
以汉字六书为科学工具
以象形审美为心理背景
以人类文化为传承脉络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责任编辑：逢乃莹

封面设计：曲春燕

欧洲算符 中国八卦

恢复中华学术的主体地位！

象形字



ISBN 7-5052-0415-7



9 787505 204157

ISBN 7-5052-0415-7/G · 150

定价：15.00 元

English说文解字

袁 立/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2000·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nglish 说文解字/袁立著.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0.1

ISBN 7-5052-0415-7

I.E… II.袁… III.英文-研究 IV.H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7253 号

English 说文解字

袁 立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印刷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
社 址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开本	850×1168 1/32
邮政编码	100037	印张	9.625
电 话	68326921 68326040	字数	180 千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次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责任编辑	逢乃莹	印次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封面设计	曲春燕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52-0415-7/G·150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弘扬创新精神 复兴中华文明

——代序《English 说文解字》

易杰雄

我是搞哲学和社会发展史的，答应给袁立这本书写序，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可能比他具体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知识经济时代正在来临，作为无形资产的信息、知识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传播和应用。中国怎么才能彻底摆脱落后？怎么才能富强强大？光靠学习是不可能超越发达国家的！关键是如何创新。我现在就稍微远一点说，略展开来讲一些东西。

扬弃传统 再创辉煌

创新，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素质，是一个国家永远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可靠保证，也是人类社会发 展、进步的灵魂。要创新，就必须有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必须进行一场思维特征的革命。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古代中国所以成为世界上公认的

强国，就是由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活跃，使中国在天文、历法、农耕、水利和冶炼技术方面有大量发现和创新。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上至少保持了 1000 多年的领先地位。

但是，正如 1922 年爱因斯坦访问日本在会见儿童时说：“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这是先辈的遗产，你们自己也应对它有所增添并传给你们的孩子们。”他最看不起那些只知夸耀前人而不思进取的人。他说过：“不要因为多少世纪以来在你们的国土上诞生过一些伟人就自鸣得意，那不是你们的功劳。还是思考一下，你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你们是怎样遵循他们的教导的吧！”

儒学是辉煌的，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其中有不少至今是仍有意义的东西。但是从其基础部分的形成来看，它毕竟是人类早年的思想成就。它所表现出来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基本特征还是凭感觉和直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和智慧主要表现在具有很强的感性直观的能力和凭直觉正确地把握事物的能力上，而不是表现为善于推敲概念、提法，通过分析、推理，利用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范畴和人们在实践中重复了千百万次的格式逻辑来揭示事物本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那种特别思辨的抽象思维能力。当然，这并不是讲我们这个民族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就不使用逻辑的方法。事实上，直觉本身也是一种逻辑，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十分“敏捷”的逻辑罢了。这更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如大数学家、哲学家。而我们是就整体上讲的，是在与西方认识事物的方法相比较而言的。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创新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如此，是有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根源的：

首先，儒学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捧到吓人的地步：“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不容许任何人在思想上对它有任何的偏离，使凭感觉和直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成为中国人思维的一种定式，这就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主张“天人合一”，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面向自然作出认同，无条件地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对自然的这种态度，只能产生一种审美与道德的价值取向，决不可能导出人们对自然的探索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一位的是“善”。人生最理想的成就有三，即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等而下之才是“立功”、“立言”。不仅如此，讲“善”不仅可以不以“真”为前提，还可以抛弃“真”、牺牲“真”，乃至为讲“善”而不许讲“真”。如《公羊传》就公开提出要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由于没有求“真”的需要，认识事物本质和运动规律所必须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发展不起来。努力读书，是因为书中有“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是为了“仕”。而这里的“优”又主要不是表现为有真学问，真正掌握了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而是指是否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口味。这样的人生目标只能使中国知识分子注重看风使舵、察颜观色，而不可能让他们注重创造性的求异思维。

二是中国始终很贫穷。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是匮乏经济，对于包括主要肩负发展抽象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要解决的还是温饱问题。亚里士多德曾十分正确地指出过：“只有一切必须的东西都具备以后……人们才开始谈哲学。”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抽象思维能力不强、哲学素养提高不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市场机制在中国长期未能形成。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本不需要，因而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向人们提出具有很高、很复杂的抽象思维能力的要求。而西方一些国家之所以整个民族哲学素养都比较好，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与它们在经济领域早就有了比较发达、千变万化、需要通过非常复杂的思维能力才能把握其规律和趋势的市场有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时有一点想不到，或者考虑不周，乃至考虑错了，都可能使自己受到重大经济损失，甚至破产。反之，如果自己的决策高人一筹，就有可能使自己获得别人不可能有的大发展。如此尖锐的现实迫使人们都要开动脑筋，做全面深入的思考。这样，必然会促使整个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

四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时间过长，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容许有不同思想的产生。对有不同看法的人，总是实行残酷镇压。普通老百姓只知秦王朝搞过“焚书坑儒”，其实汉朝有“深文周纳”，魏晋时期有所谓的“非所宜言”，唐朝搞过“罗织经”，清王朝搞过“文字狱”，直到国民党时代还搞“文化围剿”。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整有独立见解的人，哪朝哪代都未间断过。

五是中国的自然科学太落后。

15—19 世纪，在欧洲，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了分门别类地收集、整理材料并加以研究的情形，即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使人们在认识自然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方法后来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上之后，就造成了特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这种思维方式有严重的缺陷，但它却使人们对事物的细节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而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并未明显地发生这类情

况。

六是作为发展抽象思维能力的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

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受“重义轻利”观的影响，在读书、做学问的同时经营实业的历来很少。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政治体制下，都是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有的不能直接当官，就为那些当大官的人当幕僚和食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依附于权力，很难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自己要保住饭碗，甚至还想过得比别人好些，有些进取，就必须看主子的脸色行事。主子感兴趣的，就大加引申、发挥；主子不感兴趣的，就不想、不说。这就使敏锐的感觉能力和直觉事物的能力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推敲概念、提法，进行抽象、概括，运用逻辑，通过分析、推理来把握事物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这种抽象、思辨的思维能力，因为它表面上看起来远离实际，不能给人以“现得利”的好处，所以就不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

此外，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断了与世界各国包括哲学、科学在内的交流，这对中华民族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也是很不利。

我们要想有大量的创新，就必须改变主要是凭感觉和直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特征的思维方式，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抽象思维能力。

崇尚创新精神 尊重异端权力

世界的全部历史发展表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人类的认识

能力是无限的，世界上没有它不能破译的谜。不可知论和这方面的任何悲观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必须看到，由于世界是无限的，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又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我们无论是对无限复杂的整个世界，还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认识，虽然可以从现象到本质，从所谓的初级本质到一级本质，二级本质，这样无限地深化下去，但只能无限地逼近它们，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们。这就是说，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讲它是无限的，是按其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讲的。是说通过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没有不能把握、认识的事物；说其是有限的，是指人类某一历史阶段上每一代人或某些人、某个人每一次的个别实现，都不可能是什么最终的绝对真理。因此，我们不能把任何已有的认识成就绝对化，隐入盲目自满、固步自封。更不应该让它成为阻碍别人道路上的屏障，而只应把它作为认识前进、深化道路上的新的出发点和阶梯。其实，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这两种表面上看似乎绝对对立的東西有相通之处，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前者不相信深刻的思想、理论能够把握比事物的现象更重要的事物的本质；后者是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认识能力。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缺乏深刻思维能力的表现。

然而很多人并不懂得这一道理。其中有的是因一己私利害怕、不愿承认这一真理。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就是典型，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还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真理的化身，谁要是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了能更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尽管这些新见解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人民的富裕、自由、幸福大有好处，但由于与特权者们的看

法不一致，这时反动统治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对这些入实行“焚书坑儒”，这样的事在中外历史上不胜枚举。如卢梭的《爱弥尔》一书，由于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教育，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然教育的主张，所以，一出版，巴黎法院立即下令当众焚毁，并逮捕作者。卢梭不得不因此而流亡国外。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些既自私又无能的小人，其实他们本人并无研究能力，知识也极其有限，甚至连明确的信仰和判断力也没有，他们只不过是為了个人有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大的知名度和越来越多的实际好处，故意千方百计地迎合反动统治者而不惜“曲言阿世”。当反动统治者对有真知灼见的革新者表现出不满时，他们总是蜂拥而上、口诛笔伐。喋喋不休地重复反动统治者的意见和已有天才们的结论。仿佛只有他们对统治者和已有的天才最忠诚，仿佛他们比天才还天才，真理只能在他们手中，连篇累牍的文章，一本一本的著作，其实不过是先贤现成结论的拼凑，甚至满纸都是蛮不讲理的所谓“理”。他们不仅没有增添过任何前人所不知道的东西，还严重地毒化了社会气氛，阻碍了社会进步。他们这种做法除了提醒革新家、创新者应提防这类投机家，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他们从来不考虑这样做会怎样地祸国殃民！相反，他们还都是以最最爱国的面目出现的。

当然，在抵制新思想、新观念的队伍中，也不乏那些对旧理论出于真诚的信仰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单纯是为了坚持和捍卫已有的真理。这样的人当然也是极可尊敬的，他们这样做对保持人们在科学认识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另一个方面帮助创新者锻造新的真理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如果把已有的认识成果看成是僵死的教条、不容逾越的顶峰，客观上必然会束缚科学的进步。

科学上的每一重大进步几乎无不如此。一个科学家，在科学探索道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拥戴和奖赏。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如此，一些人由于把已有的认识成就绝对化，由于新发现、新发明超出了常人的认识水平，实际上遭到的却是压制、打击、迫害乃至杀身之祸。布鲁诺就是因宣传突破了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一致并得到宗教神学承认的托勒密的地心说而被控宣扬异端，被宗教裁判们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尽管它如此抽象、如此远离现实生活，但由于突破了公认的权威牛顿经典力学的框框，发表时也未能逃过卫道士们的批判、谩骂、攻击和中伤。正如他自己所说：“外面发表的针对我的无耻谎言和诬陷的东西多得可以用大桶来装，如果我对他们稍加注意的话，那我早就成为泉下之鬼了。”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医生、生理学家塞尔维特经长期深入、艰苦的研究，最先提出了关于血液由右心室经肺动脉支管和在肺组织内与它相联结的肺静脉支管流入左心房的正确见解。同时，他还预见到血液按心肺血液循环流动的生理意义。但是，由于他的这些见解违背了早已被宗教神学所利用并长期统治着人们思想的古代生理学权威盖伦的观点，结果，1553年10月，宗教裁判所把他和他的著作一道送上了火刑场。从而使血液循环的发现推迟了70多年。

在这方面最叫人难以理解的恐怕要数那些在科学上也曾有过重大建树，有的甚至在自己的创造、发明、突破过程中也曾受到过打击、压制的人，在自己成了学术权威之后，不是奖掖后进，而是对突破了原有科学成就的后来者——这个后来者有的甚至就是自己的学生，极尽压制、打击、甚至迫害之能事。如，1844年，瑞典青年化学家阿伦纽斯发表了《电解质的导电性研究》一

文，创立了电离学说。这一学说冲破了戴维和法拉第的经典电化学理论，为“离子科学部门”的分析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在化学发展中是一项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成果。然而化学界的一些权威们对此不但不予承认，反而嘲讽、压制、非难、打击。阿伦纽斯把这一学说的思想讲给母校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化学权威克列维教授听时，本指望能得到他的指导和推介，没想到克列维听完后竟当面说他是“胡说八道”，是把“鼻子伸进不该去的地方”了。当阿伦纽斯在该校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宣读他关于“电离学说”的论文之后，在座的教授、权威竟群起而攻之，说这是“无稽之谈”、“荒谬绝伦”。不仅如此，阿伦纽斯的论文发表后还遭到英、德、法、俄等许多国家著名化学家的激烈反对，甚至还因此形成了一个由著名化学权威组成的国际反电离学说战线。为首的就是因发现元素周期表而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此外还有以研究溶液理论而为世人瞩目的英国化学家阿姆斯特朗，以发明溶液渗透膜而著称于世的法国化学家特劳贝和以研究溶液电动现象而闻名于世的德国化学家魏德迈等人。在他们看来，电离学说有悖于经典的电化学理论，因而是“不值一提”的“奇谈怪论”。学术权威们的错误反对，严重地阻碍了这一新学说获得公认、传播与发展。德国青年数学家康托尔的命运更惨。他创立集合论，在数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可是，他的创见却遭到当时数学界一些权威的激烈反对。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就是他自己的老师、著名数学家克隆尼克。克隆尼克不仅阻挠康托尔有关集合论的学术论文的发表，还到处对他进行诬陷和攻击，硬说康托尔犯了非常危险的“数学疯病”。这样的打击、迫害竟延续了10年之久。康托尔原在哈勒大学任教，收入较少，为能获得较高的薪金，他多次想到柏林有声望的大学里取得教授

职位。克隆尼克得知后千方百计进行破坏，致使康托尔的愿望一直实现不了。

无数事实表明，由于对已有认识成果绝对化，把它们变成认识深化、发展道路上的极限、屏障，不仅使本应受到社会拥戴和尊崇的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的天才遭到不应有的打击迫害，还使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发现和公认的时间上被大大拖延，在传播与应用的范围上大大受到限制，从而使社会进步受到严重阻滞，归根到底也使这些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积极参与抹杀、诋毁创新成果，打击、迫害创新天才的人犯下了叫人很难宽恕的历史罪过。

宇宙中还有无穷的秘密人类至今尚未涉足过，等着我们去揭开，去做开拓和奠基的工作；此外，有些虽然研究过了也取得了成果，甚至还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认识成就，但仍可以而且必须进一步深化、丰富、发展它；有些虽然研究过，但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或有部分看法错了，有待我们在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去纠正它、完善它。总之，认识无止境、科学无禁区。不许探索，不许有不同看法，是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的。

在创新过程中，新的认识即使与已有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根本对立，明显违背“常识”。这也不应该是阻挠探索者探索、否定他们新看法的理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已有的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是怎样的大相径庭、根本对立，又是多么明显地违反“常识”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牢记：“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文版，单行本第32页，人民出版社）。历史上多少“知识里手”和“权威”由于忘记了这一点，留下了多少笑柄和惨痛教训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已有的认识成就，他们都是创新的楷模。

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语，转引自《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这就是说，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4页）。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这样的志向：“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们最终创立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同志从来就反对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主张“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895页，人民出版社）。他创造了据以解放全中国的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个思想对于一切创新都特别重要。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光明日报》1998年3月5日），这是对历史的精辟概括，也是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

把握时代脉搏 树立全民族创新意识

今天，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贡献率

已高达 80% 以上。世界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情况已难以描述，以至于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沃伦·本尼斯认为，对于这种变革速度和规模的描述，“只有夸大其词倒反近于真实”。据统计，人类科学知识增长一倍所需的时间，在 19 世纪是 50 年；到 20 世纪中叶是 10 年；目前仅需 3~5 年。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社会这样快速发展的原因——“技术是火车头，知识是燃料”。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从现象上看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实质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更确切地讲，归根到底是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上的竞赛。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还错误地对已有的认识成果绝对化，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把自己的认识看作是不能逾越的屏障，不允许别人探索，不许别人有任何不同看法，只要求别人与自己保持一致，使一个民族和国家丧失突破、创新能力，失去生机与活力，就是在创新上重视不够，组织不好，受教条主义因循守旧思想影响的人多、创新少，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我们自己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得很大，从而永远受制于人。所以，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再三强调：“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强调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

既然创新如此重要，那么，怎么才能有更多、更重大的创新呢？

首先，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像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提高对创新意义的认识，“要十分重视创新。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造成全社会以开拓进取、努力推动社会进步创新为荣，以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为耻的浓厚风气。

其次，科学研究上的突破，真正的创新，首先是对世界及其

规律认识上的深化，是艰苦求真的结果。因此，要想使我们的创新事业真正有新的起色、蓬勃发展，就必须努力清除传统文化重善不重真这种价值取向，做到真善并重。

再次，创新首先是观念上的创新。这就需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把原则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提倡遇到事情都能问个为什么，都能有自己的见解，善于独立思考。特别是对那些看起来与经验事实并不矛盾的东西，对那些公认的真理和权威的东西不盲从。

第四，创新是突破原有的框框，不善于独立思考，不敢怀疑，不牢固确立起求异思维是做不到的。要创新，就必须注意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第五，要想创新，“就必须有深入事物本质的大胆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科学理论越是深入，它所包罗的范围越是广大，“经验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愈小”（爱因斯坦语）。我们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一个民族要想提高创新能力，站到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最后，大规模的创新，需要有大量具有很高文化素质与专业知识的人才。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好培养、造就人才这一基础性工作。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应当像有些发达国家曾经做过、而且至今还在坚持的那样，用政策法规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真正把教育放在首位。人才培养出来之后，要相信他们，尊重他们，依靠他们，给他们提供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施展聪明才智、进行创新的舞台。有了成果，要坚决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保证他们能获得由于他们的创新而增值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把科教兴国的战略真正落到实处。